



“结构—功能”互适性理论： 转型农村创新社会管理研究新解释框架

——基于农村社会组织的维度

李志强,王庆华

(吉林大学 行政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当前农村社会的转型,根本而言是农村社会结构基础的变迁和重构过程,农村社会结构的深度调整提出了再适应性的新功能载体建构的迫切要求。农村社会组织本身作为内嵌于农村社会结构的重要系统,不仅其外显样态和内潜功能的重塑动力根源于社会结构的流变,而且其发展和创新对社会结构的重塑同样发挥着形塑和建构作用。这种探讨正是基于“结构—功能”理论框架的分析视野,在转型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的大背景下,实现农村社会组织新功能与新社会结构的有效契合,并达致农村社区新的共同体秩序的依据所在。

关键词:农村社会管理;农村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结构—功能”互适性理论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7465(2014)05-0008-10

当前农村社会的转型根本而言是农村社会结构基础的变迁和重构过程。社会结构系统的快速流变和深层解构,同承载传统社会结构的功能载体张力凸显,农村社会结构的深度调整提出了再适应性新功能载体建构的迫切要求,农村社会秩序同步走向新规范和再整合时期。社会组织作为内嵌于农村社会结构的重要系统,不仅其外显样态和内潜功能的重塑动力根源于社会结构流变,而且其发展和创新对社会结构的重塑同样发挥着形塑和建构作用,这种双向推演路径较好地契合了“结构—功能”理论关于社会系统构建的“结构二重性”观点。某种程度而言,转型农村社会之所以出现结构混乱和失序局面,是因为当前嵌入农村社会结构的组织系统出现了“主体不在场”状况,难以有效应对流变中的社会结构不断提出的新功能诉求。社会组织作为社会结构的基本构成要素,其本身形态不仅是社会结构的先验表达,更是直接影响着社会结构的形变和构建路径。社会本身的形成过程就是组

织社会结构要素的建构过程,这种组织过程路径本身也形塑着社会管理的运行模式和现实图景。因此,组织演变正照应了社会的发展变迁,两者初步具备了理论层面的契合性逻辑框架,与农村社会管理的现实纳入了共有对话空间。这种探讨正是基于“结构—功能”理论框架的分析视野,在转型农村社会管理创新大背景下,如何实现农村社会组织新功能与新社会结构的有效契合并达致农村社区新共同体秩序的依据所在。社会转型时期,现代性的主体元素和市场逻辑已在农村社会场域高调登场,当时代变迁元素嵌入到传统农村这个特定社会系统中,将会与该系统的原有结构要素如何相互影响进而推动农村社会的流变,现存的“复合型”社会结构为原有的组织要素功能变迁提出了怎样的现实路径?在当前的时代背景和现存农村社会结构下,以农村社会组织为突破口,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理论依据又是什么?这些都是中国转型时期农村社会治理创新很有价值的基础性问题的探索

收稿日期:2014-03-3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促进社会公正的公共政策分析”(10BGL08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我国社会公平正义现状测评与改善对策研究”子课题(12&ZD060)

作者简介:李志强,男,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分析、公共治理。

研究。

一、转型农村社会管理研究述评与新框架探讨

1. 转型农村社会管理研究述评

转型期农村社会管理研究,由于受政策话语关照而带来的聚焦效应和学界的农村基层问题意识凸显而尤为活跃,涌现出大量研究成果。对这些成果细致研读,深入反思评判是推动农村社会管理研究发展并突破创新的重要前提。综述已有研究成果,农村社会管理研究呈现出主流研究范式的“二元性”,主要指被学界普遍认可的“国家—社会”互构关系的分析框架以及制度主义分析框架。农村社会的发展始终处于乡村力量和国家权力双重博弈中,农村管理变革模式和体制路径从未脱离国家的社会整合轨道,当前农村社会管理创新实质是新形势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塑过程。当然伴随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自主发展,“第三条道路”的分析范式也愈加凸显。乡村社会发展及治理变革内源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外在于国家体制改革和社会管理制度的推进。乡村治理作为一种制度性安排,会随着乡村社会演化而不断推移和变革,这是制度主义分析范式的预设前提。农村社会问题研究多维度性,以及分析单位、对象选取的复杂性和综合性的格局,使两种主流分析范式下又包含了多种研究视角,如学者指出的“制度变迁视角”“国家政权建设视角”“公民社会视角”“多中心治理视角”“社会重建视角”及“共同体”视角等,都是农村社会管理研究的基本工具和重要框架,此诸多范式和视角构建起了农村社会研究较为系统的理论架构。^[1]但综述而论,无论是基于西方话语框架下的“国家—社会”分析范式抑或“公民社会”“多中心治理”等分析视角的经验启示和工具借鉴,抑或为适应本土特殊性而对某些“拿来主义”的西方理论框架作出调适和修订并积极开拓农村问题研究新视角的尝试,还是基于中国农村自身情势和本土经验而选取的研究视角,就某种程度而言,都难以避免单一研究路径的缺陷和不足,对问题的解读易局限于“西方话语框架”和“朴素的经验主义”视野框架中。

这是因为中国农村问题研究跟一般的社会研究相比,其分析路径和理论工具的使用,往往在表征一般价值的同时而带有其特殊性,这是由中国农村的历史背景、现实境遇和发展轨迹的独特性决定

的。对于转型社会的中国农村而言,市场化改革和现代化开启虽然将我国总体社会进程纳入了西方社会发展轨迹,但由于受现代化发展模式、现实国情、社会文化及乡土风俗的特殊性影响,我国农村社会的历史进程和社会变革仍然保留着自己独有的发展脉络和现实逻辑。由此可见,尽管西方的理论在解释我国乡村社会发展及社区治理层面有其可行性和借鉴意义,但毕竟是基于西方现实情势提炼而来,即使经过了某种程度的修正和调适,也很难摆脱西方理论话语框架。对于中国农村问题语境的特殊性而言,选择合适的理论框架应该是基于中国特定情境和事实之上,通过对比先验性结论而作出适宜性选择,而非利用先验性理论范式去筛选相应的经验事实来论证理论框架的适用性。中国乡村研究的重要代表“华中乡村派”曾主张,对于中国农村问题语境研究,理性的做法是应该将西方经典理论与中国传统研究的合理性思维批判相结合的道路。这种研究路径既有效摆脱了农村本土化实证研究所凭靠的“野性的思维”陷入朴素经验主义陷阱,又尽力避免了“中国农村经验研究为基础的学理性研究,自觉不自觉地将研究破碎性地嵌入到具有相对完整性因而也就具有强势整合性的西方式纯学理研究之中”^[2]。从更深层次而论,这是一种宽广的学术视野和深邃的学术情怀。邓正来曾面向近代中国多路径研究争辩的事实指出,如果从各种流派不同模式的争辩中进行深刻反思和论证,则可能发现它们实际上依据的是同一个“规范认识”。正是对这种支配不同解释模式的“规范认识”的意识,近代中国研究者才有可能揭示出具体模式论辩背后的基本规范认识,并通过对近代中国材料的实证研究,证明这种规范认识的危机和指出解决问题的出路,形成多元规范认识的局面。这可能是知识增长或学术提升的一种路径。^[3]

2. 转型农村社会管理研究框架新探索

转型农村社会管理的研究多种分析框架的争鸣和探索,实际上也逐渐形塑着农村问题研究的“规范意识”。前文已经指出,农村社会管理研究“国家—社会”和“制度主义”两种主导分析框架已经成为学界普遍认可的重要范式,并发挥着重要的研究导向作用。但很明显两种分析框架的缺陷也事实存在,这也是引起学界争议的主要原因:“国家—社会”关系分析框架起源于西方,西方政治结构与封建专制主义变革后仍旧保留某些国家集权主义特征的东方国家存在明显差异,根本上局限了

该分析框架的运用空间;“制度主义”视角为乡村研究提供了较为规范性和严整性的理论路径,但忽视了农村社会特殊地方知识的秩序依赖和文化惯性的运转逻辑。这样一种整体性和统筹性规范视野均欠缺的结果,极易导致研究者陷入一种二元悖论或顾此失彼抑或牵强附会的理论困境。当然,这种困境不是无法逃脱的“死胡同”,因为无论是“国家—社会”分析范式还是“制度主义”分析范式(包括公民社会、共同体、国家政权建设及多中心治理等研究视角),背后实际上存在着一条根本的共通思路,这就是如何更好地阐释国家现代化建设及市场改革所牵引的社会大转型背景下,所带来的社会基础性结构层面深度调整的现象,以及探讨为组成现阶段社会基础结构发挥新秩序重建功能的社会主体提出怎样的重塑要求以适应新时期的社会结构的研究逻辑。以“国家—社会”(包括公民社会)的分析框架为例,国内学者对中国国家和社会关系乃至市民社会的话语探讨,基本遵循着国家与社会各自所具有的发展逻辑和自主性所建构的良性互动关系展开的,是一种能拓展为实现民主政治的可欲的基础性结构,以及如何构建和采用何种路径达致这一目的而预设的。^[4]这实际上体现了一种以良序社会结构为建构目的的研究思路。而对于制度主义分析框架而言,制度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的规则、秩序和组织的结构性安排,中国农村社会基础结构和组织基础一直处于国家主导型的变迁模式中并形成了某种制度依赖。农村社会结构实际体现了一种制度化的特征,同时制度主义也指出了“地方秩序”在体现社会意义和社会结构的独特作用。制度主义者通过关注由环境机制、关系机制及认知机制所促进的过程,揭示行动与结构互动过程中存在的能动性根源。^{[5][22]}制度结构概念有助于把对制度的结构性分析与制度运行的能动性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由此可知,在这种概括式模糊分析的背后,两种主导当下农村社会管理研究的分析框架,实则背后都有一条主线牵引,那就是社会的结构与功能如何相互适应的问题隐喻。这正是我们提出农村社会管理研究“结构—功能”互适性理论的基本依据和预设前提。

二、转型农村社会管理研究新框架:

“结构—功能”互适性理论

1. “结构—功能”互适性理论简述

结构功能主义自产生之日起,就以其开阔的理

论视野和显效的社会解释力彰显出极强的生命力。特别是上世纪70年代后,伴随着新功能主义的理论修正并日臻完善,继续保持住了社会学的主导地位,结构功能理论框架依旧成为解析社会科学相关问题的主流理论,并在自身理论框架不断修正和发展的基础上,对社会科学研究产生着重要而持久的影响。从某种程度而言,结构功能主义的广泛影响和自身的不断完善,证明其本身就是一种具备相当借鉴价值的理论视角和分析范式。结构功能理论旨在把研究对象抽象化为“系统”或“体系”的文本概念,以清晰界定出事物的边界特征,并把内嵌于系统中的结构看作是影响其当前样态和演变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关注子系统之间的有机联接与合理整合,以多层次、立体化的思维路径去探讨事物发展各相关因素相互联系起来的整体式和一体化分析路径,或以功能分析角度揭示社会生活和社会系统得以维系的必要条件。这提醒我们在观察社会问题时,首先要把研究的对象系统看作是具有一定合意性结构和功能的有机组合的整体,这种合意性使系统在应然层面能够具备推动自身延续和发展的内在机制和特质,也使得系统内部的各组成因素结构和功能虽有差异,但基本具备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普适性。这种共通性理路为社会系统的分析提供了宏观和微观视野相互通约的框架,更成为应用于社会各组织存在研究的特质所在。

农村社会转型实质是农村整体社会结构的变迁过程,这种结构化变迁对承载转型社会秩序的功能重构提出了现实要求,基于农村研究跨学科的理论诉求,结构功能分析路径开始进入农村研究学者视野。有学者认为结构功能理论对和谐社会的建设有重要价值,帕森斯的社会整合方法对当前的制度建设有重要借鉴,同时文化对社会协调和整合作用不可忽视^[6]。村治研究对结构功能给予了较多关注,有学者以基层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及社区公益组织等方面的功能重建为视角,探讨转型社会结构与组织功能的适应性培育和发展^[7];有学者从转型农村社会结构分化的视角阐释了农村社会组织整合功能的重要性^[8];还有学者从结构功能理论视角对城乡一体化实现的原则和路径进行了阐释^[9]。从现有文献看,结构功能理论的使用比较松散,大多只是为迎合研究需要而对其中部分内容的抽取和分割使用,缺乏农村社会结构系统和规范的研究框架。这也从侧面说明,结构功能理论在转型农村社会研究领域尚有很大扩展空间。这种

评判正是本文尝试系统拓展和深化结构功能理论框架来分析转型农村社会问题的基本立足点。

“结构—功能”互适性框架的提出,是基于经典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修正^①,尤以更成熟完善的后结构主义理论框架之上调适和发展的。这种理论框架旨在对原结构功能理论取向的社会结构研究的理想化、整体化和稳态化思维做出矫正,而尝试一种片段式、动态化和开放式的更接近社会系统现实样态的理论框架,体现出均衡和包容的思维精神。从社会科学本体论出发,转型社会结构研究理论中的“国家—社会”“结构—行动”等都是—般性理论^[10],而再次派生出的“国家社会互构论、国家中心论、社会中心论”等都是具体的研究纲领和路径。实际而论,这两种分析框架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交集,具体问题的分析可以由两种工具派生出的具体研究纲领形成新的研究策略。“结构—功能”互适性解释框架的提出就是基于这样一种研究策略观点的探讨。它同时摆脱了国家与社会二元框架中单线决定论和互动回应论,既不主张国家是结构变迁的主导者,而是提出“自主性国家能动”的理念^[11],也不认为社会结构对行动主体有决定性影响,即国家结构层面的变动并不一定换来社会行动层面的均衡式对等回应,行动者也并不必然对社会结构的变化作出对接反应(它有本身相对独立的行动逻辑)。这种框架的理论精神,意味着社会结构及各行动者诸要素,同时存在且相互影响、相互塑造——行动主体必定在社会结构框架内活动,但并不意味着国家结构必然决定社会的行动和结果;有目的、有理性的行动,即“能动”,既可能促进结构调整,也可能促使国家改变其行为方式,最终的结果是指向某种和谐的良好秩序结构,即互构到均衡的思想,这是一种趋向“结构—行动者”双依附模型的建构努力^[12]。当然这种均衡也并非终极状态,结构与行动者的关系更多地呈现出一种接近均衡而很难最终达致理想状态均衡的运动过程。这种观点同法国组织社会学派的观点类同,“结构”(某种程度被抽离的国家制度和权力下的社会背景)^[13]与“行动者”(公共空间各要素、社会组织及能动团体)的关系是一种非均衡式的动态调适模式^[14]。转型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所带来的行动者功能适应的动态变革是一种不断演进的过程,结构与功能的均衡适应以达到良性秩序是最终的目标方向,这样目标的达成实质始终处在社会动态的建构过程中,研究者的视野也应该是在一种动态式和

非均衡化框架内进行。笔者认为这应该看作当下转型农村社会问题研究的根本思维导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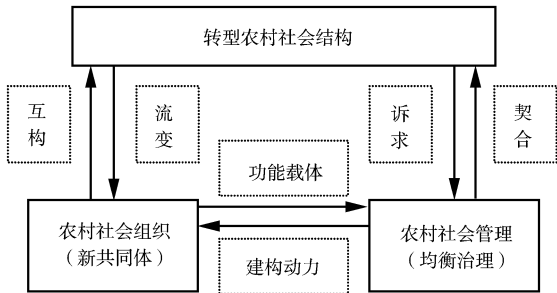


图1 转型农村社会管理场域三维系统互动框架图

2. 转型农村社会管理结构功能理论视角:农村社会组织维度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纵深挺进和权力格局的重新整合不断解构着社会的整体结构,农村社会结构分化和资源流动、利益调整的动能释放出了社会的空间活力,基层自治自主的制度动力和利益诉求回应的需求日益高涨,农村社会公共空间发育的条件不断成熟。在这样一种较为宽松的制度氛围和相对开放的社会环境下,具有社区自主诉求和体现群体公共意识的农村社会性组织的出现成为必然,嵌入变迁的社会环境同时改变着农村社会重构的基础要素和组织条件。转型农村社会的整体变迁和深层演化在导致农村社会传统结构不断走向流变解构的同时,也提供了新农村社会结构重构和社会生态走向新形态的动力机制。农村社会组织作为嵌入农村社会结构的重要系统,同社会结构的流变逻辑呈现同向性,并在转型农村社会大环境嵌含的组织场域中同时形构着彼此。在这种组织共同体的场域中,这些组织构成了共同的意义系统,彼此之间发生着更频繁紧密的互动,延续和拓展着场域组织的生存空间。根据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观点,农村社会组织的建构作为回应

① 面对结构功能主义传导出的整体社会结构强大而个体力量式微,被忽略的整体主义方法论的非理性倾向,图海纳明确称这一状况是“行动者的缺席”,认为这种缺席在之前的社会理论中,是一个值得反思的特征,这种反思旨在对各种形态的“结构主义”“结构功能主义”加以批判,在批评中彰显行动者的主体性,呼唤行动者的归来(Touraine,1988)。吉登斯也指出这种结构的特点是“主体的不在场”,并创生出“结构二重性”的观点,认为行动者和结构不是互相独立的既定现象,并非“二元论”而是二重性的东西。结构不是什么“外在之物”,而是记忆的痕迹并展示出的内在于“人的活动”社会实践。本文也侧重于这种观点,将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用于农村社会结构变迁中的社会组织研究,可以从结构和行动主体双重层面面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外在环境和内部动力机制及集体行动逻辑解释的同时,又对现实农村社会的新结构和组织逻辑进行重构,更好地阐释转型时期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视角和实践维度。

变迁中的农村社会结构中的行动者维度,本身是同社会结构糅合互构在一起的,同时农村社会组织系统的建构过程在社会结构的变迁中重塑了新的功能框架,逐渐达致了同步适应转型社会环境的新要求。农村社会组织作为内嵌于农村社会场域的重要主体,其自身的发展和完善不仅直接影响了农村社会管理的整体面貌,而且本身构成了社会管理创新的内容(图1)。如果精炼概述社会结构与社会组织及社会管理的逻辑关系,则基本可以得出如下表述:转型时期的社会管理之所以成为现实紧迫命题,根源于社会转型所牵引的社会结构的变迁而引致的承载新社会秩序的功能重构要求,社会组织作为社会结构的基本构成要素,其外在样态的形变和内在功能的重塑不仅能够有效契合流变中的社会结构功能诉求,而且成为现实的重要驱动力发挥着推动和完善农村社会管理新共同体秩序的建构功能。在这样的逻辑推演和理论预设的前提下,转型农村社会管理场域下的三维系统互动的框架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组织开放系统视角是组织理论研究的主导路径,也是本论题提出的结构功能视角下转型农村社会组织研究的基本理论借鉴。^{[5]77-79} 结构功能研究的组织开放性视角强调了个体要素(个体参与者和子群体)的复杂性和多边性及相互之间的松散联系。开放系统将注意力从结构转移到了过程,强调组织与周围及渗透到组织要素之间联系的相互作用,环境被看作物质、能量和信息的终极资源,所有这些都成为系统延续的关键。开放系统研究的视角对组织领域和方法的开拓,从将组织作为个体行动微观分析的具体情景,到视为整体化运作的集合体,再到更大的组织系统的构成部件,这种对于组织分析对象的工具性预设,越来越清晰地勾勒出结构功能理论的基本特质。正如新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所言:“结构功能主义在描述性而非说明性的意义上提供了一种社会各部分间相互关系的一般图景,它认为社会是由彼此联系相互作用的各部分之间组成的多元的、开放的系统”。^[15] 显然,如果把组织视为一种社会系统,结构功能理论无疑会对组织的结构与过程分析有很大的帮助。

结合新功能理论的主要观点,结构功能综合分析范式对于农村社会组织研究理论框架的建构有以下启示:首先,功能主义像关注结构那样关注行动。在注重实践与手段工具的同时,也不忽视目的与价值方面的兼容。这种特征可强化对组织结构

与行动者两个维度的共时态关注,有效整合自然系统和理性系统的分析视角。其次,功能主义关心作为一种可能性的整合和作为一种事实的越轨行为和社会控制的过程,以均衡作为功能动态分析的均衡点,既有自稳态均衡、自我调节均衡,也有描述生长和变迁的发展结构的动态均衡。这种关注能够提升对组织的动态化运作的特征和演进的路径化过程把握。第三,结构功能理论提出分化的社会变革观念,这有利于提供组织变迁概念中结构转型和功能重构的社会空间转化的话语框架,清晰揭示组织存续发展的时空生态环境,把握组织变革的基本规律和发展趋势。需要注意的是,基于中国农村问题的特殊性,本文需要在对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有选择性地吸取、融合相关更符合客观实际的概念逻辑来综合构建可行的研究框架。换言之,如果我们承认中国社会的历史积淀以及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政治社会的特殊性,就必须用中国的现实情景和经验素材来验证已有的相关理论预设。

三、“结构—功能”互适性框架下的 转型农村社会组织阐释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双重转型和流动的现当代性诸因素的共时作用,塑造出了当前中国社会组织勃兴的时代环境,并且迅速变革的转型社会环境也同步催化着社会组织新的功能诉求,不断为社会组织提出了迎合环境变革的行动目标和发展方向。伴随集体化时代主导的管控式思维的消弭,国家垄断下的农村社会资源开始自由流动,农民的自主活力被不断释放。村民自治主导下的农村政体模式的全面覆盖,极大地激发着农村政治参与热情和公民民主意识的强化。农村社会组织生长的活力因子被逐渐激活,各种社会组织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在中国农村的现实场域中真实地扮演起了各种角色,这即是一种基于“环境—行动”展示路径的逻辑推演(图2)。根据“结构—功能”互适性理论中社会系统与环境的关联分析,农村社会组织系统本身作为内嵌于更大社会系统的子系统,其属性赋予和特征演变由组织运行的客观情境和环境界定,农村社会组织系统与转型外在环境即宏观社会之间需产生目标一致的契合关系。^{[16]17} 换言之,农村社会组织系统应存在于环境之中并对环境起“适应性”反应。那么,“环境”与“反映”(行动)之间关系对应的具体涵义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可以借

用吉登斯的“结构—行动”二重性思维视角加以解读,即转型农村的环境变迁导致了农村社会基础性结构的整体变革,变革的结构为农村传统组织的新建和再造提出了行动要求,其中主要的体现就是农村社会组织的功能重构对于变迁社会结构的能动反映。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对于组织重塑诉求的产生,可以概述为三方面原因:一是村庄权力格局和道德秩序的重新整合。公社化组织解体和国家权力上收的转型村庄面临“革命”道德话语退场和“伦常”道德话语式微的窘境^[17],重建现代关联,恢复村庄生活秩序的“现代公共规则”也尚未建立^①,村庄日益呈现原子化甚至碎片化危机。二是村庄生产秩序恢复和生活共同体的重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尤其是农村税费改革以后,村委会等基层组织及传统社区在组织集体生产和发挥社区服务功能的双重缺位,导致了农村社会面临再次失序局面。^[18]三是个体生存关照和生活世界意义重建。市场逻辑、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冲击带来了乡村社会的“结构混乱”,社会主义国家与私人转型悖论伴随着“无功德的个人”^[19]工具式生存模式泛滥,村庄生活世界意义的共同体趋向解体。因此,无论是转型农村社会结构的重建,还是道德秩序或者生活意义的恢复,都为其中间连接作用的组织重新登场提出了迫切的时代要求。

1. 转型农村社会结构与组织的互构逻辑

“结构—功能”互适性理论认为,行动者和结构不是两个互相独立的既定现象,双方存在二重关系,是互构式过程。结构展示于社会组织的实践,内在于人的主体性活动中,结构变革同步推动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吉登斯认为,社会结构既是社会行动产物,又是社会行动平台,社会结构展示了一种双重角色:它们既是组织起来的实践的中介,又是这些实践的结果,而且这种过程总是以历史循环的方式进行着。个体行动者实践过程中,既受到社会结构的制约,又得到社会结构的使能和赋权。社会结构实质是社会活动的模式化呈现,这些模式化的巩固和定型就逐渐演变成了制度,制度性的实践就是“那些深深嵌植于具体时空中的实践”。制度化是一种社会结构得以建立和维持的过程,制度化的互动模式则构成了社会系统。^[20]社会系统理论“有机论”观点也认为,“任何要素的本质特征都是与其他要素之间的关系的结果”,^[21]即是互动的行动者(社会组织主体及参与个体)建构了社会结构,社会结构又反过来建构了各行动者。社会结构是

由规则或模式(行动模式)和资源模式(包括人,环境,文化等)二元要素构建而成,通过组织中介达成双方的互构和耦合。社会结构为组织及个体提供了行动意义,而组织及个体又在行动过程中建构和重塑了新的社会结构。农村社会转型是结构连续性和断裂性的统一,个体能动性只有借助组织中介才能反作用社会结构,最终引发社会变迁,沿着一定轨迹前行。将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用于农村社会结构与组织的互动关系分析,使我们既能对转型农村的社会环境变迁根源加以挖掘,并对转型农村社会秩序重构的动力来源进行深入探讨,又提出了转型时期创新农村社会管理视域下的新社会结构和农村组织演化逻辑共时态建构的思考,有利于从理论视角和实践维度更全面阐释转型时期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的结构化功能及路径分析的框架内涵。^②

2. 转型社会变迁视野下农村社会组织重塑动因

我们之所以探讨转型农村社会的管理问题,现实目标就是重新建构农村社会秩序,避免由于利益分化和价值失范造成严重的农村社会的分裂化甚至碎片化,重新建立农村社会治理基础和组织基础,走向新的社区共同体。转型中,农村社会作为转型中国整体社会大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既有的情势也鲜明地反映出了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历史演变态势和发展轨迹。改革开放以来,以市场化改革为重要驱动力的现代化进程为中国社会带来深刻的系统化整体变革,旧的社会结构被逐渐瓦解,新的秩序在型构的过程中,重新整合的时代环境为新时期的社会组织和个体提供了有利的生存和发展契机,塑造着国家与社会的全新关系。这种转型大环境所带来的社会整合的良好机遇为开放社会的自组织化提供了动力,市场化改革下的资

① 张静认为,在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的时代背景下,社会管理的服务公平、公正要得到更好保障,就必须充分尊重和遵从普遍主义的现代公共规则,“规则的公共性,即规则无涉于个别、专门利益的中立性质……公共规则的基本内涵,就是权力从个别别人和个别集团的垄断中过渡到公共控制,参与并分享权利的人具有公共特征,即所谓的“普遍主义规则”。

② 所谓“社会转型”理论,重点不在于对社会形态,价值观点和行为模式变迁的描述,而是对社会结构的重点关注,本质而言,社会转型就是社会结构的转型,这已经成为学界共识。我们不主张使用一般的阶级阶层分化的视角去研究转型社会,因为这样很容易流于空泛的结构化概念的模糊视野中,难以在实际中操作,而且容易割裂社会结构与主体行动者之间的互构关系,使结构固化,导致社会结构主体的行动个体或组织游离于结构之外。因此,对于转型农村社会管理研究,结构理论动态化分析框架具有更合理的理论契合性和现实操作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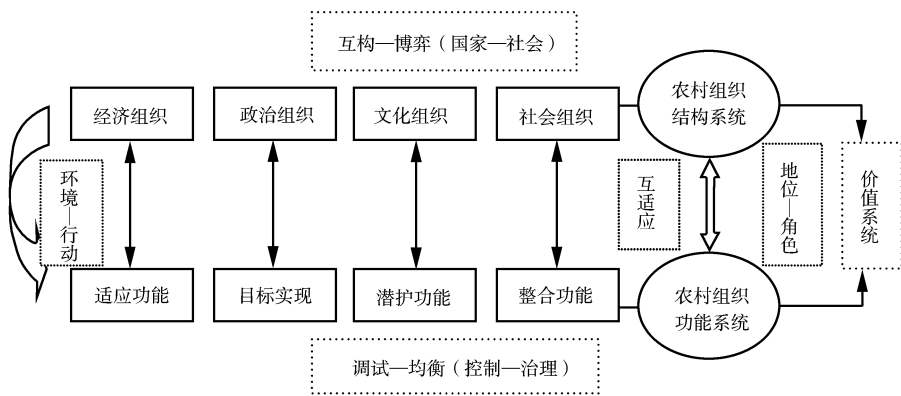


图 2 转型期农村社会管理(组织)结构功能框架下的整体系统图

源的自由流动和行政放权的政治制度变迁的历史环境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境遇。这可以看作是社会转型时期农村社会组织勃兴的动力学分析。当然这种动力及由此所产生的顺延发展的轨迹不是自在地出现的,某种程度上具备制度依赖的特征。制度学派的“路径依赖论”认为,制度变迁并非偶然异于传统,而是具有内在规律性,任何制度变迁都来源于传统博弈的影响,并进而影响下一阶段的博弈状况。如阿夫纳·格雷夫(Avner Greif)所指出的:“从过去承袭的信念、规范和组织,将构成新制度产生过程的部分初始条件”。^[22]转型农村社会管理的制度变迁包含了国家与农村社会一系列因素的转型及重构过程,无法不受到前续阶段的影响。制度创新的动力机制对于农村组织创新起到了一定的传输作用,农村组织的创新也是农村管理制度的创新。有学者认为,农村管理模式创新的“路径依赖”,既存在于农村治理的首创样式,也嵌入进国家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路径安排中。^[23]换句话说,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公共管理制度的变迁就是民间力量“诱致”,然后经由国家承认经试点检验,并由国家通过制度化的途径加以“规划”和“强制”的结果,这种管理制度路径的推演模式在中国农村的社会管理历史沿革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3. 转型农村社会组织的功能价值和系统意义

转型农村社会的碎片化和个体原子化,是导致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所在。从此意义而言,重新建立社会关联,重新整合社会就成为转型农村社会面对的紧迫课题。农村社会再组织化的探讨显然应成为重要的话题进入农村问题研究的视域中。涂尔干曾明确指出,“要想治愈失范状态,就必须首先建立一个群体,然后建立一个我们所匮乏的规则体系”。^[24]从西方的经验看,在前现代时期社会

组织的发展和成熟不仅为个体提供了归属感和安全感,也起到了缓和与国家与个体矛盾的作用。历史和现实的经验证明,社会再组织化,是克服社会碎片化和个体原子化,重构社会关联的重要途径之一。就现实而言,国家社会管理思维的逐渐开阔和社会协同治理的诉求不断强化的时代背景,为农村社会组织的合理乃至合法进程打开了广阔的空间。农村社会组织身份的确认和明晰化,开始在社会管理的舞台上扮演起重要角色。从某种意义上言,农村社会组织“地位—角色”的历史转变,正式“入场”的社会管理的大舞台历史境遇变迁,既是国家农村管理制度路径依赖推进和延伸的结果,更是农村社会管理思维的转化及农村治理模式突破和创新的生动体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社会的快速转型,也使农村组织的制度环境和意识形态面临着全新的环境。社会转型带来农村政治、经济、文化及价值层面的系统化变迁,同时赋予了农村社会新的发展内涵,这就为承接新需求的农村组织的功能赋予了新的内容。结构功能理论认为,社会是特殊类型的社会系统,与行为有机体系统、个体的人格系统和文化系统共同构成整体社会大系统。在帕森斯著名的“AGIL”功能选项理论中,提出了适应、目标达成、整合与维模四个基本范畴来概括行动系统的基本功能要求。在他的图示中,就农村社会组织系统而论,适应功能对应的是经济体系统,即农村社会组织场域中的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类别,主要发挥着从环境中获取资源维持生存的能力和手段;目标达成对应的是政治体系统,即农村自治机构(村委会、党支部等),任何系统都要有目标导向,必须有能力确定自己的目标次序并调动系统内部的能量以集中实现系统目标,核心是政治权力;整合子系统生产和输出的是涂尔干意义上的“团结”,主要体现完成重构新共同体的能力;维模系

统又叫文化—动机系统,其核心是价值观和承诺,更多地体现在系统意义和德性层面。换言之,价值系统是维系农村社会组织结构系统与功能系统两者之间稳定且内在的链接和纽带。正如帕森斯所言,组织的价值模式是分析任何一个社会系统的主要基点,价值模式决定对其所在的系统所采取的基本取向。^{[16]18}从此意义而论,对于农村社会管理中的组织功能重构研究其本质意义,是解释转型农村社会管理模式变革和思维转化背后的深层化的价值模式嬗变问题(图2)。社会组织本身构成了社会管理价值的维度,社会组织也是实现社会价值和制度规范的主要载体,组成实现社会管理价值的功能系统。社会管理价值是社会管理的灵魂,决定着社会管理的方向,并制约着社会管理功能的有效发挥。可以说,价值系统的分析是转型农村社会管理研究不容忽视的本源性问题。

4. 转型农村社会组织重塑路径

“结构—功能”互适性解释框架相比传统结构功能理论更具有系统性、动态性和开放性的分析视野。就转型期农村社会管理研究的理论架构和现实路径而论,结构功能理论是基于“分化—整合”方法论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这种视野的理论精神,蕴含着均衡和包容的价值诉求,意味着社会结构及各行动者诸要素之间同时存在且相互影响,“能动”式的有目的、有理性的行动,既可能促进结构调整,使结构系统适应能动者的主体意愿和行为模式,也可能促使行动者改变其行为习性,主动迎合演化中的社会结构提出新的功能诉求。这种依附中的互构形态,最终结果是指向某种和谐的良序秩序结构,即互构到均衡的演化逻辑。这种逻辑不仅是结构功能理论方法论意义层面的路径阐释,也是走向社会现实操作层面的目的导引。具体而言,转型农村社会组织重塑路径可从三方面尝试:一是组织生长动力方面,将农村“内生”需求主导与社会“外部”激励力量结合,明晰“让农民组织起来”^[25]和“把农民组织起来”^[26]两种组织动力的权界和功效划分,以农民理性主导和政府培育及社会力量参与相结合,采取自办、官办与官民合办的路径^[27],分类有序推进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和成熟。这是体现农村组织发展权力结构的均衡;二是组织发展模式方面,重点扶持与一般发展相结合,实施多元发展的思路以迎合农村结构分化提出的功能需求多元化样态,根据组织社会功能效益评估和反馈状况,实施差异化发展策略,但应注意在政

策和制度设计适度倾斜的同时也要做到全面覆盖。这是体现农村组织发展支持结构的均衡;三是组织指导理念方面,强势控制和弱势保护相结合,农民组织需要结合地域经济、民俗文化及当地实际情势,因时因地、适度发展;一方面必须警惕“农民组织起来的陷阱”^[28],对于组织后的强势资本和强势集团有可能造成对农村资源和经济利益的垄断施加控制,另一方面要注意“兜底”公平,对于边缘化、弱势组织给以适当保护,配之以政策和资源方面的适度倾斜,体现农村组织发展利益结构的均衡。总之,从学理阐释走向实践探索,转型农村社会组织重塑路径应遵循均衡建构的思维,以转型农村社会组织系统均衡运转为基点,重塑嵌入农村社会结构的各系统机制运行规则和组织安排制度模式,以有效解决转型农村社会管理秩序失范和共同体生活意义及文化、价值规范等问题。

四、简短结论与后续问题探讨

中国农村转型社会的外源性变迁引发了社会结构基础及组织基础的演变,由此催化了嵌入其中的农村社会管理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也随之发生显著变化,为契合社会转型对农村社会管理创新要求的新情势,作为重要载体的农村社会组织的功能一直处于动态的历史演化和过程嬗变中。在面对转型农村社会的结构变迁和组织模式的转变时,我们需要对中国乡村社会的闭合性以及开放性的社会、人与文化的基础给出一些理论性的思考,在对乡村社会的“同质性”与“闭合性”、“异质性”与“开放性”的平行式同向思考的同时,也要看到不同特征之间的交叉式反向思考维度。正如有学者认为,乡村社会的闭合性与开放性这两个维度之间从来不是割裂的两个独立的实体,而是相互影响、相互转化的两种面相。^[29]换言之,常态化嵌入农村社会结构的农村组织形态及其功能的演化本质,是基于农村社会结构和组织基础时空承接前提下所呈现出的延续性的推演和发展样态,或者说转型农村组织的功能属性是在契合现代农村内含的强闭合性和同质性的“稳态化”传统结构基础需求前提下,对体现现代农村开放性和异质性社会“变态化”结构特征诉求的重塑和创新。由此,对于转型农村的社会组织而言,需要同时满足传统与现代双重社会结构的功能诉求,而与之相应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应着眼于农村社会组织改造完善基础上的发展和

创新。

“结构影响功能,功能影响结构”^[30],对于转型农村社会四大类组织结构与功能动态适应的实现,需要经济组织系统完成风险共担到资源均衡的转化,政治组织系统实现总体控制到权力共享的转化,整合组织系统完成多元异质到和谐共生的转化,维持组织系统达致利益分化到价值认同的转化,实现农村社会组织新的功能体系与变迁社会结构新诉求的良好契合。实质而论,转型农村社会管理的创新,就是要在维护农村各主体利益均衡和良序互动的基础上,在公平、正义等共同体价值导向下,合理地处理农村社会结构系统失衡、农村社会组织的功能重塑和责任配置以及农村社会组织功能与社会结构新诉求之间的张力等问题,从而以制度“嵌合”和结构“共生”为要旨,实现各系统结构功能间的良性互动和动态平衡的同时,实现社会利益的合理配置、良性社会秩序的维护以及各主体权益的最大化。当然,这种研究框架的合理达成需要借助农村社会组织运行路径的三方面理论解释补充:“调试—均衡”中的农村社会组织演化的路径分析;“互构—博弈”中的农村社会组织发展的动力机制分析;以及走向“新共同体”的农村社会组织重构的目标指向分析,以此构建和完善转型农村社会管理创新视域下农村社会组织演化解释的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结构—功能”互适性理论框架有可能成为研究转型农村社会管理具备一定理论解释力和现实操作性的分析思路。

参考文献:

- [1]李增元.乡村社区治理研究:分析范式、分析方法及研究视角的述评[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2(4).
- [2]吴毅,贺雪峰,罗兴佐,等.村治研究的路径与主体——兼答应星先生的批评[J].开放时代,2005(4).
- [3]邓正来.近代史研究中的“规范认识”: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N].光明日报,2013-04-18.
- [4]邓正来.市民社会与国家——学理上的分野与两种架构[J].中国社会科学辑刊,1993(3).
- [5][美]理查德·斯科特.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3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 [6]刘文祥,李长源.和谐社会的理论借鉴:结构功能理论和冲突理论[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
- [7]周云霞.结构功能主义视阈下的农村社会管理创新——基于2005CGSS的实证分析[J].东南学术,2012

- (3).
- [8]吴业苗.对转型期农村社会组织整合功能的特性分析[J].前沿,2002(2).
- [9]汤芷萍.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的城乡一体化研究——以奉贤区为例[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
- [10][美]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斯蒂芬·克拉斯纳.世界政治中的探索与争鸣[M].秦亚青,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4-5.
- [11]王礼鑫.公共空间、集体行动与中国公民社会的生成——业委会及业主维权的“自主性国家—结构—能动力”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辑刊(冬季卷),2009:4-8.
- [12]周怡.市场转型期的“国家—社会双依附模型”——以改革初期温州“农民造城”为例[M]//邓正来.当代中国基层制度个案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68-70.
- [13]周怡.社会结构:由“形构”到“解构”——结构功能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之走向[J].社会学研究,2000(3).
- [14]埃哈尔·费埃德伯格.权力与规则——组织行动的动力[M].张月,等,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27-29.
- [15][美]亚历山大.论新功能主义[J].国外社会科学,1991(3).
- [16]帕森斯.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M].梁向阳,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17.
- [17]谭同学.桥村有道:转型乡村的道德权力与社会结构[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184.
- [18]贺雪峰.组织起来: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研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8.
- [19]阎云翔.中国社会的个体化[M].陆洋,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 [20][美]乔纳森·H·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M].吴曲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77.
- [21]Hodgson, Geoffrey M. The return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In The Handbook of Economic Sociology, edited by Neil J. Smelser and Richard Swedberg. Princeton, Nj and New York: Pre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and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4:61.
- [22]Greif, Avner. Institutions and the Path to the Modern Economy: Lessons from Medieval Trad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17.
- [23]吴新叶.农村基层非政府公共组织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93.
- [24]埃弥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渠东,译.上海:三联书店,2000:17.
- [25]于建嵘.新农村建设与实践:让农民组织起来——我们的实验和思考 主持人的话[J].东南学术,2007

(1).

[26] 郑向东. 把农民组织起来:关于新形势下巩固党在农村执政基础的思考[J]. 人民论坛,2009(18).

[27] 苑鹏. 中国农村市场化进程中的农民合作组织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2001(6).

[28] 贺雪峰. 农民组织起来的陷阱[J]. 人民论坛,2011(4).

[29] 赵旭东. 闭合性与开放性的循环发展——一种理解乡土中国及其转变的理论框架[J]. 开放时代, 2011(12).

[30] [美] 罗伯特 K 默顿. 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M]. 唐少杰,等,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166.

(责任编辑:刘浩)

“Structure-function” Mutual Eligibility Theory:New Interpretive Framework of Transformation Rural Social Management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Dimension of Rural Social Organization

LI Zhiqiang, WANG Qinghua

(College of Administration,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 The current rural social transformation serves fundamentally as the foundation of the rural social structure changes and reconstruction process, and the in-depth readjustment of rural soc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imposes a higher demand on the vehicle construction for new function of re-adaptation. The rural social organization itself as an important system embedded in the rural social structure does not only depend on the social structural changes for its external form and internal functions, but also plays a formative and reconstructive role in its reshaping of social structure with its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The analysis in this paper wa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e-function”: in the background of transformation rural society management innovation, the new function of rural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new social structure should be effectively integrated, so that the common new order for rural new society is obtained.

Key words: Rural Social Management; Rural Social Organization; “Structure-function” Mutual Eligibility Theory; Mutual Eligibility